



# 拯救生育率 韩国对高考“开刀”

## 即兴发言?

在距离韩国大学修学能力考试(即韩国高考)仅剩150多天,韩国总统尹锡悦做了一次“即兴”发言,引发了一场关于高考的风暴——高考内容出现重大调整,曾让韩国高中生闻风丧胆的“杀手题”将成为历史。

所谓“杀手题”,指的是出现在韩国高考卷面上,却超过公立教育体系范畴的题目。在尹锡悦看来,这是造成学生过度依赖私立教育的主要原因。

简言之,就是高考题太难了,不得不依靠补习班来“卷”。

即便受新冠疫情影响,韩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韩国课外补习产业依旧热度不减。根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的数据,2022年韩国学生课外补习率高达78.3%,韩国家庭在补习班上的花费接近26万亿韩元(近200亿美元)——这几乎相当于海地(210亿美元)和冰岛(250亿美元)等国家的GDP。

这一畸形的私立教育产业链,也被普遍视为导致年轻人心理健康恶化,以及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。

韩国自杀率多年居经合组织国家之首,青少年抑郁问题呈现越发严重的态势。与此同时,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两年在198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一。就业形势惨淡、育儿成本过高、社会流动性低,以及性别不平等,已成为年轻人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。

尹锡悦并非第一个在教育公平问题上拿私立教育开刀的总统,然而,如果尹锡悦真如自己所表现的那样关注教育问题,那他应该明白,只取消“杀手题”,并不能真正抑制私立教育产业的发展,并为学生减压。

有专家指出,由于教育极度“内卷”,普通人对未来不抱有期待,政府真正需要做的,是培育有竞争力的公共教育体系,并解决高校金字塔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问题。

作为一个极端但又典型的样本,韩国何以走到了今天?其教育与生育陷阱,值得所有国家警惕。

所谓“即兴发言”,其实暗藏玄机,不亚于一场政治大戏。

事情发生在6月15日,尹锡悦在听取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李周浩汇报教育改革工作时,“意外”谈及与汇报内容并无关系的高考议题。

当天,李周浩在新闻发布会上传达了尹锡悦的意见:“公共教育课程中不涉及的问题,应该被排除在高考内容之外,不然将会造成学生无条件地依赖私立教育。”

言论一出,韩国社会一片哗然。四个小时后,韩国总统室对此划清界限,表示“这只是尹锡悦总统要求李周浩减轻课外辅导所作出的原则性发言,旨在通过公正高考使公共教育正常化,减少课外教育负担。”

与此同时,由于韩国6月举行的一场全国模拟考中,仍出现了所谓的“杀手题”,外界争议再次发酵。

事件变得更加跌宕起伏。紧接着,教育部于16日对主管高考的教育课程评价院院长李圭民下达了“待命”命令,此时距离李圭民上任仅过去六个月。

6月18日,尹锡悦向李周浩发出了警告,认为是李周浩随意解释了自己的话语,导致了这次争议。然而,就在第二天,事情又起了变化。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在国会开会决定,高考将排除“杀手题”,这一决定将从9月模拟考开始适用。

## 教育与生育

韩国高度内卷的教育模式,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。只是如今,更加危险的情况正在发生。

在韩国,围绕教育开展的这场长达十余年的“军备竞赛”,让学生和家长身心俱疲。在韩国中学生之间,甚至流行着“四当五落”的说法,即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能考取理想院校,而睡五个小时则很可能会落榜。

根据《朝鲜日报》发布的统计数据,2021年,韩国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为73.7%。在经合组织国家之中,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(51%)、英国(57%)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。然而,其中只有2%的学生进入了名牌大学,并且几乎都来自私立学校。

韩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“SKY”(被称为“天空之城”)——首尔大学(S),高丽大学(K),延世大学(Y),是大企业招聘的“后花园”,因此也被普通人视为能改变命运的跳板。由于无力负担私立学校费用,更多的家庭选择投身于课外补习班。

据韩国《中央日报》报道,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,花在初中以及高中课外补习费用,已相当于饮食费用和物业费用的总和。

即便当前韩国经济形势低迷,普通家庭被迫缩减生活支出,有关调查显示,多数受访者的教育支出,依然纹丝不动。

针对这一现象,有韩国大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韩国国内存在一种看法,即除了一些令人羡慕的职业群体之外,其他人都是“失败者”。在这种背景下,考上一个好学校,争取一份好工作,成为衡量普通人存在

意义的唯一标准。

据韩联社报道,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国民力量籍干事李泰珪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,党政一致认为,“杀手题”是助长课外补习的根本原因。为确保高考公平公正,高考题目不会出现公共教育课程以外的内容。

针对这一相对混乱的决策过程,韩国总统室对此的解释是,从去年开始,尹锡悦就下达相关指示,只是教育部在此期间并未执行。

然而,韩国诸多政界人士对此并不买账,认为尹锡悦只是想借涉高考言论引发争议后推卸责任。在反对党看来,不具备教育专业知识的总统,干预高考内容是“不合适的”,这一毫无征兆的举措,只会让考生和家长陷入恐慌状态。

根据《韩国先驱报》报道,一位公立高中生说,“即使我们上的是公立学校,但现在学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课外补习,我对如何准备可能决定我人生命运的考试感到困惑。”

一位高中四年级学生的母亲则表示,在这个时间点,降低高考的难度,只会刺激更多的私立教育支出。

与此同时,社交网络上,层出不穷的帖子,也宣泄着韩国学生对这一举措的不满。毕竟,在这场前期投入巨大的备考战役中,任何的变动,都可能改变这些年轻人的人生走向。

## 治标不治本

尹锡悦此举,被乐观者视为韩国高考的改革新方向,有声音表示,这可能是韩国解决人口危机的一种尝试。

但这有效吗?目前来看,尹锡悦政府并未拿出一个有实质意义的解决方案。韩国教育专家批评道,调整高考难度的举措,只是最表面的应对方式。

在教育改革中,尹锡悦从未主张将降低私立教育开支。无论是其竞选期间的教育承诺,还是其他工作报告,都找不到任何关于给私立教育降温的内容。

有韩国《中央日报》专栏作者对此表示,韩国目前最紧迫的问题,是使公立教育正常化,因为现在的公立教育已沦为私立教育的补充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问题、学历至上的社会文化,也需要改变。

在韩国,财阀企业或公务员、国企以及事业单位工作,主导了第一劳动力市场,中小企业或劳务派遣、打零工等非正规雇佣工作,构成了第二劳动力市场,两者之间的流动性极其有限,在工资待遇与发展前景上存在巨大差距。

正因如此,韩国家庭热衷于投资高等教育,这也造成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过于求。而财阀企业提供的“金饭碗”,着实有限——即便韩国前十大财阀企业的收入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近60%。

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2022年出具的报告,即使韩国小企业存在严重的用工短缺问题,但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,迫使年轻人在大企业或是公共部门的赛道上疯狂内卷,这也导致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率,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。

与此同时,受经济下行影响,拥有非正式工作的年轻人受到冲击。据韩国数字媒体Seoulz报道,在疫情期间,18-24岁的韩国人成为失业率最高的群体。

有韩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,“年轻人真正需要的,是无论你的教育背景如何,你都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工作,获得足够的工资,并得到基本权利的保障。”

现实是,多数年轻人对生活并不抱有期待。教育内卷背后,是就业市场的惨淡、对未来的焦虑,迫使年轻人不得不谨慎审视自身的存在。

生孩子?反而是最次等的需求。生育,是一个自我镜像的过程,当下的生存境况,也映照孩子的未来。

据美国媒体报道,韩国儿童保育政策专家李贞元表示,“人们如今不仅仅关心养育孩子的成本。”“要想有意愿生育,人们需要相信,当孩子长大了,他们也能幸福地生活。”

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可能过上比他们更好的生活,他们又何苦再生孩子。 据《南风窗》

相关研究表明,育儿成本的上升,可能是韩国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。根据韩国卫生和社会事务研究所(KIHASA)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,在2000名受访的韩国成年人中,已婚和未婚的,都将选择“经济不稳定”和“育儿成本高”,作为不生孩子的首要原因。

据《南华早报》报道,韩国是世界上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成本最高的国家,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.79倍。

第二高的是中国,其成本是人均GDP的6.9倍。